



张柠主编
文化先锋书系——刀锋文丛

SHOU WANG ZHE DE WEN HUA YUE LI

花城出版社

守望者的文化月历

1999~2004

朱大可 著

张柠 主编
文化先锋书系——刀锋文丛

守望者 的文化月历

1999~2004



守望者的文化月历

1999~2004

朱大可/著

花城出版社

SHOU WANG ZHE DE WEN HUA YUE LI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守望者的文化月历: 1999~2004

朱大可著.

- 广州: 花城出版社, 2005. 4

(刀锋文丛/张柠主编)

ISBN 7-5360-4534-4

I. 守 ...

II. 朱 ...

III. 随笔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

IV.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15383 号

责任编辑: 邹靖华

平面设计: 朱 竞

技术编辑: 薛伟民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广东新华印刷厂

(广州市永福路 44 号)
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32 开

印 张 9.75 2 插页

字 数 220, 000 字

版 次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200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6000 册

书 号 ISBN 7-5360-4534-4/I·3612

定 价 19.5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

朱大可，当代著名文化批评家，学者、小说及随笔作家。祖籍福建武平客家，1957年生于上海，现居上海。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。澳大利亚悉尼理工大学哲学博士，悉尼大学亚洲研究学院访问学者。崛起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，曾是当时先锋文化的重要代言人。目前主要从事中国文化研究与批评。其著述有《燃烧的迷津》和《聒噪的时代》、《逃亡者档案》、《话语的闪电》、《21世纪中国文化地图》（与张闳合编）等。以新锐的思想和独特的话语方式见长，在中国文化界负有盛名，被认为是中国最优秀的批评家之一。



目 录

第一辑 文学：舞蹈的盲肠

- 3 甜蜜的行旅
- 35 罪与罚：中国文坛的道德清洗运动
- 39 舞蹈的盲肠
- 42 天鹅绒审判和诺贝尔主义的终结
- 47 倒了大楣的诺贝尔奖
- 49 诺奖危机和文学在全球的失败

第二辑 书评：阅读和午夜的絮语

- 57 正义者的迷津
- 61 究竟谁比谁更丑陋
- 65 后寻根主义：中国农民的灵魂写真
- 70 缅怀异邦的岁月
- 74 越过女性主义的感官视界
- 78 诗歌麻将的 N 种玩法
- 83 大众文化的解密时代
- 88 “上海神话”和市民社会的隐形
- 92 500 年历史细节的精密拼图
- 95 我坐在加缪先生的山顶上
- 98 文化口吃与学术真相
- 101 民族失忆与新记忆运动

第三辑 大众文化：繁华声浪中的退行危机

- 107 快乐的权利



- 111 消费时代的意识形态传奇
- 114 嗲、嫩、贱：日常美学的“三字经”
- 117 春节文化的四大恶俗
- 120 繁华声浪中的文化退行危机
- 123 古哥文化和第二次资讯革命
- 126 “内裤逻辑”及其文化景气指数
- 128 “零年代”的男色崇拜
- 130 赵饶案：绯闻消费的文化解读
- 133 嘉年华：从静寂民俗到尖叫消费
- 136 整蛊主义、祖国花朵和伦理危机
- 139 上海精神和老克腊主义
- 141 上海：情欲在尖叫
- 146 零年代：大话革命与小资复兴
- 156 考研狂潮、学位崇拜和知识神话
- 159 瘟疫、肺癆、萨斯：疾病美学三部曲
- 166 肉身叙事的策略、逻辑及其敌人
- 174 “荡妇”麦当娜和香烟变法
- 177 女胸的三种历史语文
- 180 蒙娜丽莎微笑的文化解码
- 183 中产阶级偶像芭比小姐
- 186 从母亲到荡妇的偶像转型

第四辑 小众文化：英雄的梦呓

- 193 两种人本主义及其书法对抗
- 198 在反叛与皈依之间
- 202 英雄的梦呓和暴力美学
- 205 埋伏在影院里的文化霸权

- 208 文化讼战和费厄泼来主义
- 211 “假领主义”和上海文化的本性
- 214 文革暴力话语的民间复活
- 217 “孟席斯现象”和史学危机
- 220 “人文主义”，还是“人纹主义”
- 223 文化意识形态批判书
- 239 娱乐政治学的社会公约

第五辑 时政：屁权之争

- 245 五四和新文化幽灵的世纪徘徊
- 250 约伯之痛：我们无尽的哀歌
- 253 曹杨新村博物馆刍议
- 256 话说乞丐这档子事
- 257 范志毅这只球
- 259 将野生动物大餐进行到底
- 261 人民大会堂的门券
- 263 屁权之争
- 265 萨斯政治中的两种动员模式
- 269 非典危机中的上海“守望社会”
- 273 再见，亲爱的萨斯同志！
- 275 非典卫生学：肺主权、咳嗽政治和公共体温
- 282 上海在文化变法的前线
- 286 牌坊下的处女膜政治
- 289 文化的伪饰与还原

代跋：我跟文学离婚已无可挽回/孤云

第一辑

文学：舞蹈的盲肠

甜蜜的行旅

——论余秋雨现象

文人和大众的新和解运动

品读余秋雨的历史散文，蔚然成了近年来中国大陆的时髦风气。如果我没有弄错，在革除了深度和力度的所谓“后文化时代”，这是继汪国真之后在散文和历史交界处所发生的一个重要事件。显然，历史和文学正在制造出一些新的产品：历史利用文学获得“美丽外观”，而文学利用历史获得了“精神深度”。由此带来的文化狂喜，可以从该书的发行量上得到证实。

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，不妨让我们先回忆一下汪国真的诗歌（以下简称“汪诗”），尽管这是一件颇令人难堪的事情。

海子死了，汪国真诞生了，这是1989年6月以后中国文学所发生的最富戏剧性的变化。海子一举带走了农业时代的诗歌真理，并为“汪诗”的涌现开辟出血的道路。“不合时宜”的“旧式”精神使徒，最终让位给了一个肤浅的诗坛流行歌手。这正是“历史的必然”。“海诗”不过是少数校园理想主义者的圣经，而“汪诗”才是热爱生活的广大女学生的起居事典。在中国成为全球最大市场之后，诗歌条码化的潮流势不可挡。



越过那些抨击者的痛心疾首的呐喊，“汪诗”在市场上茁壮发育，后者表达了“后文化时代”的“拉罐文学”的主要特征：第一，高度通俗(彻底放弃原创性并对精英思想作简陋拷贝)；第二，用过即扔(彻底放弃经典性写作)。更为重要的是，在经历了海子式的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”后，人们只需一种非常轻盈的“哲思小语”，像粉色的口红一样，涂抹在苍白失血的精神之唇上，以滋润营养不良的文化面颜。

这样一种“生命能够承受之轻”的诗歌口红，在一个高速消费的市场化图景中，无疑是非常和谐的物象。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阻止它的涌现和受宠。在90年代上半期，“汪诗”的情形大致就是如此。而在90年代末的今天，“汪诗”甚至和王朔、苏童及王小波(后者情形或许有些不同)一起，发展为网络消费的主要对象。在那些文化网站和网上文化超市的货架上，这些物件早已经融入了日用品的亲切行列(对此我只是有一点点惊讶而已)。

4

余秋雨的散文(以下简称“余文”)与之有非常类似的经历。一个富于戏剧性的例证是，据说在上海的一次“扫黄行动”中，警方从某妓女的手袋里查出了三件物品：口红、避孕套和《文化苦旅》。这个传闻在海内外文人圈子中流传甚广，并且在一次港台文化研讨会上成为一个尖锐的话题(可以参见台湾《中国时报》和新加坡《联合早报》当时的专题报导)。余文因而受到了人们的攻击，似乎其作品一旦成为性工作者的读物，就变得十分可疑起来。

这无疑是一个完全错误的理念。在我看来，即使这一“捕风捉影”的传闻属实，它也决不能成为“媚俗”之类的“道德化批评”的借口。相反，它的重要意义被包含在它的隐喻性之中：在那个女人的个人视界里，《文化苦旅》就是她的“文化口红”和

“文化避孕套”。它们是一组互相隐喻的同义语词，具有完全相同的日用品功能，被收藏在一个“意识形态的手袋”里。余文正是这样一种文化消费品，但却比汪诗更加“耐用”，因为它不仅是用以点缀生活的“文化口红”，而且还是“文化避孕套”，审慎规避着那些道德“病毒”。

“后文化时代”的特征是：精英不再引领大众，而是大众支配“精英”。这种结构倒置的后果就是精英的全面湮灭：这个曾经散发着思想香气的阶层，已经被大众与全球一体化市场与资讯洪流所吞没，只有少数人继续浮在水面。他们是市场的先锋，犀利地洞悉大众趣味的转移和文化的市场走向，并且利用这点对大众进行“反操纵”。他们通常受雇于国际（或区域）资本，藉其专业特长为世界大亨效力，同时也利用国际资本实现其个人的文化野心。

我要援引电影《泰坦尼克号》导演詹姆斯·卡麦伦与国际传媒大亨梅铎的关系来表明这点。一个老套的好莱坞言情故事，在近似疯狂的高额制作之后，产生了巨大的商业回响。另一个例子是中国画家陈逸飞和美国犹太大亨哈默的关系。它们证明“精英”的信念早已过时。这个世界需要的决不再是创造思想的精英，而是追踪公众趣味与理念的猎狗。他们不再像民众提供“思想”，他们仅仅发现和供应市场所需的“模式”。

改变精英命运的另一个动力是资讯的全球化。就在最近的两三年内，由于 OCR 技术（即对扫描的图像文件可以进行自由编辑）的发明，网络文字输入的困难已经消散，平面图书资源的利用变得轻而易举，网络杂志、文化专题网站以及个人网页大规模涌现，网络文字总量（NET WORDS）在迅速增值，并为个人文化及区域文化的全球化传播开辟了阔大道路。



个人电脑对于外部消息的筛选标准与消息的来源(是否出自精英)完全无关,它吁请着所有满足欲望的“小道新闻”。由于数码网络的全球化,任何一个无聊的私密事件都有可能在一个瞬间里成为国际通报。美国独立检察官斯塔尔是利用这一资讯网络的先锋,尽管未能改变克林顿的政治命运,但他却纠正了国际数码网络的附庸地位。“数码文化”已经实现了其对“后现代主义”的全面推翻。

市场及资讯的全球化和全球的市场与资讯化,这个双向和双重的过程,彻底改变了中国文化的命运。老式艺术家正在走向衰亡,而新的文化制造工业已经发育完备:专栏撰稿人和网络作家取代了正统作家,传媒记者取代了职业批评家,行画手取代了画家,摇滚歌手取代了歌唱家,制片人取代了导演,如此等等,总之,“文化白领”取代了“知识分子”。在“取媚”大众和营造“票房纪录”方面,后者才是真正的主宰。

6

“媚俗”曾经是一个非常刺耳的术语,用来描述艺术家的“从众主义”立场,并且注定要遭到道德化的抨击。但在市场垄断一切的时代,“媚俗”已不再是一种罪恶,而是一种基本的文化策略,用以从大众的口袋里找回金钱和尊严。

“媚俗”的合理性正是这样被确认的,它吁请着中国知识阶层的妥协和蜕变。他们在进行文化的包装和推销方面,显示了某种天生的丽质:一方面反叛传统意识形态,一方面向群众大肆“献媚”。市场原则被严肃地建立了起来。

这是80年代艺术家走向市场化的先锋。而在他们背后,成千上万的文化推销员或传销员在90年代期间茁壮成长。这一蜕变,受到了出版界、影视界和演艺界“资本势力”的有力支持。而其结果是,中国文化领域出现了一个诸如“独立制片人”、

“自由撰稿人”的“文化中产阶级”圈子，除了隶属于大众和金钱之外，他们获得了空前的“自由”和“独立”。

对此我没有什么异议。恰恰相反，正是市场交换策略避免了文化的最后崩溃。或者说，它维系了文化和大众的基本关系。经历了几千年的不屈不挠的战争之后，在一个“后资本主义”的世界性背景中，“文人”向大众趣味和资本势力妥协与合作的时刻终于降临。

在这个剧烈变化的时代，余秋雨作出的努力是令人赞赏的。在文化(历史)的市场推销方面，他获得了令人惊异的成功。在我的记忆里，余文首先在上海的《收获》杂志连载，而后，在经过市场的反复测试之后，才在出版社结集出版。而后是一个消费者的盛大晚宴。余文被不断连续地出版、转载、报导，成为中国各大城市的主要畅销图书，它甚至出现在几乎所有的中文网站或杂志上，与鲁迅和林语堂的作品一道成为现代散文的经典之作。一时间，大有不读余文、羞谈文学之风。

在这期间，我们也能够听到一些愤愤不平的声音，似乎这种成功本身成为余的一个罪证：“他媚俗，因而他有罪。”愤怒的十字架竖立起来了，痛苦的战士手执锤子和铁钉，要在文学和史学的领域审判余文，吁请它的退出。余对此深感不平，1998年期间，他在新加坡的《联合早报》上连续发表短文，以一个权威人士的身份进行话语自卫，对“批评”的“轻蔑”和“痛心”跃然纸上。

这是一种好莱坞式的戏剧性景象：一方面作家在重构与大众的文本蜜月，一方面批评家在不停顿地控诉这种努力。在这场诉讼中显然只有一个裁决者，那就是大众。这个价值陪审团将运用市场原则，对这个作家的“生死”(用港台流行的术语说，就是



“走红”还是“过气”)作出终极判决,而这一判决的结果已不言而喻。

煽情主义的话语策略

为了在阅读者那里引起必要的市场价值回响,选择恰当的话语策略,已经成为后资本主义时代代言说者的一项基本技巧。这种策略包括:1. 确立具备市场价值的话语姿态(这个过程是内在的);2. 寻找大众关注的文化(历史情结)母题;3. 寻找大众热爱的事件或(事件与人物)模式;4. 采纳高度煽情的叙述方式,等等。几乎没有任何当代畅销作品能够逾越这个市场策略框架。

在《文化苦旅》中,我们可以透彻地看到书写者所采用的话语策略。基本母题是经过历史鉴定而永垂不朽的,那就是一种浸透着知识分子的“忧患意识”的传统“爱国主义”(也即“民族主义”,这正是该书发行时面临的一种流行思潮),而后在这一母题的引导下进入深度操作的层面(这点我将在后面作进一步阐释)。

第一篇《王道士》是一个奠定民族主义基调的重要篇章,它确立了整部书的话语(价值)姿态:这个道士以他的无知和贪婪出卖了中华文化的瑰宝“敦煌石窟艺术”珍品。这种道德化的母题和“故事”完全符合大众的“民族主义”走向。不仅如此,书写者还使用了一些煽情主义话语记号来强化这种戏剧性的效果。

这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。王道士只是这出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。一位年轻诗人写道,那天傍晚,当冒险家斯坦因装满箱子的一队牛车正要启程,他回头看了一眼西天凄艳的晚霞,那里,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正在滴血。……

(在王道士用石灰粉刷壁画和按一个农民的趣味“修

改”雕塑之后)今天我走进这几个洞窟,对着惨白的墙壁、惨白的怪像脑中也是一片惨白。我几乎不会言动,眼前直晃动着那些刷把和铁锤。“住手!”我在心底痛苦地呼喊,只见王道士转过脸来,满眼困惑不解。是啊,他在整理他的宅院,闲人何必喧哗?我甚至想向他跪下(朱案:“跪下”这个词用得耐人寻味),低声求他:“请等一等,等一等……”但是等什么呢?我脑中依然一片惨白。

偌大的中国,竟存不下几卷经文!比之于被官员大量糟踏的情景,我有时甚至想狠心说一句:宁肯存放在伦敦博物馆里!这句话终究说得不太舒心。被我拦住的车队究竟应该驶向哪里?这里也难那里也难,我只能让它停驻在沙漠里然后大哭一场。我好恨!……

“伤口”、“滴血”、“下跪”、“恳求”乃至“哭泣”,所有这些意象或独白都展示了一种露骨的煽情技巧。尽管它从文学技巧上看相当笨拙,但在读者市场却是双重有效的,它既点燃了读者的历史怒气,又使之产生了对作品乃至书写者的无限钟爱。这样的例子在余文中俯拾皆是。

审视余文的基本母题,从往事怀旧(对家乡、童年、老师、故人的缅怀)、历史、文人和王朝(官吏)的恩怨关系,到百姓耳熟能详的民间传说、著名的风物掌故、地理,均已包含煽情的内在语法。文人的怀古幽怨、现实感伤、古典雅趣和爱国胸怀,最终都汇入了大众的价值关怀的博大江河。迷离的历史在这里被现实化和通俗化了,或者说,封闭的历史在新的诠释下重新向大众开放。经过情感包装的技术处理,最终成为图书市场的畅销商品。

这种情形在台湾和香港已经有过相似的先例。除了柏杨撰写



的中国通史，还有一些古代典籍的现代诠释版以及各种通俗的古代思想的“简体字版”或“漫画版”等等。但是，在许多人看来，这种市场化的策略还不够彻底，因为它们仍然存在着某种阅读障碍。一个纯粹理性的历史文本，无论怎样利用现代大众话语，均难以彻底解决这一问题。

只有余文和少数几种文本击碎了这最后的壁垒。只有它成功地利用历史随笔与情感化的叙述方式，引发了大众的阅读回响。尽管人们并未从这些历史诠释中获得新的概念，但封存在历史中的传统价值和现代生活的断裂，获得了某种修复；旧式文人的理想、趣味和面容遭到了大众之手的亲切抚摸；而最终，所有这些破碎的历史掌故的花瓣，均温柔地漂浮在民族主义的池沼之中，编织成了汪诗式的诗意图景。那么，在一个所谓“建构大中华文化圈”的大汉民族主义思潮中，余文受到台湾、新加坡（香港有所例外）乃至世界各地华人知识分子读者的响应和鼓掌，便是十分自然的事情。

即便如此，据余秋雨在《文化苦旅》的“后记”中记载，仍然有出版商认为余文尚不够“通俗”和“轻松”，“很难成为在每个旅游点兜售的小册子”，故决定作“大幅度删改”，幸而得到了及时拯救。我不认为这个“插曲”可以用来证实余文的不够“通俗”，相反，它只是一次市场消费定位方面的技术分歧而已：究竟是把它当作实用旅游指南，还是当做普遍适用的日常精神生活导引。毫无疑问，后者能够更好地在市场运作中实现余文的文化价值。我也不同意作者在这篇“后记”中之所言，此书的出版只是“一种侥幸”，恰恰相反，它充分表达了文化消费市场的热切愿望。